地理學報　第三十四期：19-39 (2003)
JOURNAL OF GEOGRAPHICAL SCIENCE (34) : 19-39 (2003)


# 臺北產業結構變遷與其世界城市功能發展之限制

# Taipei's Economic Restructuring and the Constraints of Developing World City Functions

金家禾*

Chia-Ho Ching

**Abstract**

The world cities hypothesis depicts that world cities have become the command-and-control centers for global economic operation. One of the theoretical discourses is that the economic structure of a world city is shaped by the functions the city performs within the world cities system. Of particular importance is the growth of Producer Services (PS) industry that has become the key sector leading the development of a world city's economy. In its drive toward world city status while undergoing economic restructuring, Taipei's manufacturing sector has declined but its PS industry has not been developed to a level that would allow the city to gain global competitiveness and guide the city's future economic development. This paper identifies and analyzes two major factors that have affected the nature of the city's economic restructuring and constrained the effort to enhance its global functions, especially PS. The first one is the subcontractor role played by Taiwan in the global economic system. The second factor is Taiwan's identity politics that has aimed at de-linking Taiwan with China. These two factors have strongly influenced Taipei's economic development and restructuring.

* 國立臺北大學地政系教授

Professor, Department of Land Economics and Administration, National Taipei University.

**Keywords: globalization, world cities, producer services, subcontractor, identity politics.**

## 摘　要

世界城市假說論述全球化所形成之世界城市體系漸成為全球經濟活動之掌控中心，世界城市內部之產業結構也深受其於此網絡體系中所扮演之功能角色所影響，尤其是因應掌控中心功能之發展，生產者服務業普遍呈現快速成長，甚至成為帶領當地發展之主領產業。然而，臺北於邁向世界城市之發展過程中，似乎並未發展出具跨國競爭力之生產者服務業，成為帶領臺北經濟成長之主領產業。本文主旨在於論述臺北產業結構之變遷與其世界城市功能之發展有關，然而有兩項因素深切制約臺北全球性功能發展，因而左右其產業結構之變遷與生產者服務業之發展，此兩項因素是：臺灣以製造業代工為主要之角色納入全球經濟體系，及臺灣於國際間特殊政治地位所衍生之兩岸關係與認同政治 (Identity Politics) 之議題。

**關鍵字：全球化，世界城市，生產者服業業，代工者，認同政治**

## 前　言

全球化所引發的產業空間分佈變動，及所造成的城市產業結構變遷已成為重要之研究議題，因為由全球化向度探討城市經濟發展及產業結構變遷，提供一個架構得以解釋造成其結構變遷之原因，進而具體討論如何調整產業發展策略，使之具備全球導向之功能，並吸引具前景之產業、高素質之人員及先進之技術與資金等，以促進及維繫當地之經濟繁榮 (Douglass, 2000; Sassen, 1995; Smith and Timberlake, 1995)。

有些研究者透過對產業發展及其空間分布影響之觀察，發現許多重要城市已成為全球經濟體系運作的重要節點，一方面指揮掌控世界經濟得以運作之人員、貨品、資金及資訊之流動，是產業之指揮控制中心 (企業總部)、金融機構及許多高階服務業之集中地，同時，是將地方資源與經濟活動納入全球體系之門戶，這些城市間因所具備之功能及掌控能力不同，而形成階層體系，然而此階層體系可能因不同城市間之相互競爭發展而有所變動 (Taylor, 1997)。

另一方面這些城市內部的產業結構也產生變化，主要是服務企業及支援跨國營運的生產者服務業 (Producer Services; PS)[1] 快速成長，甚至於有成為都市核心產業的趨勢 (Clark, 1996; Friedmann, 1986; Taylor *et al.*, 2002)，這是因為於全球化發展趨勢下製造生產活動分散於全球佈局，同時又產生對生產管控與集中統籌規劃功能之需求，如此對屬中間性投入之生產者服務業需求日益增加，以提供跨國企業於全球運籌帷幄上所需之服務，使跨境之經濟活動與指揮掌控工作得以順利運行，PS 產業也因而日益細緻專業化與快速成長 (Sassen, 2002)。

再者，支援企業總部進行跨國營運及管控功能之 PS 產業呈現集中發展之特性，全球指揮掌控功能越強的城市，PS 產業之成長及集中程度也越高，故 PS 產業之發展便成為全球化過程中之重要特

徵，也是判斷特定城市於全球經濟與全球／世界城市體系中所佔有地位之一項指標 (Clark, 1996; Friedmann, 1995; King, 1990; Taylor, *et al.*, 2002)。於此概念下探討全球化及特定都市納入全球經濟體系運作所產生之結構變遷議題上，PS 產業之發展多成為關注焦點，促進 PS 業之健全發展也成為重要策略 (Cox, 1995)。

扮演臺灣對外門戶的臺北，於臺灣經濟實力增強及日益對外擴張投資之過程中，也漸具有世界城市之功能特徵 (Friedmann, 1986; King, 1990; Tayor, 1997)。然而，於邁向世界城市之發展過程中，臺北似乎尚未發展出具強勁跨國競爭能力之 PS 產業，及成為帶領經濟成長之主領產業。本文主旨在於論述臺北產業結構之變遷與其世界城市功能之發展有所關聯，並聚焦於探討兩項因素深切影響臺北全球性功能發展，因而限制其 PS 產業之發展與左右其產業結構之變遷，第一項限制因素是與臺灣以往所採取納入全球經濟體系之模式有關，即是受到以製造業代工為主要擔任之功能或角色所限制；第二項限制因素是；臺灣於國際間特殊政治地位所衍生之兩岸關係及境內政治認同議題，所造成於研訂應對全球化之跨國佈局與經濟發展策略上之爭議與延遲不決，而無法建立共識，研訂明確之方向，邁步地進行產業結構之調整，迎向全球化發展。也正由於此兩項特殊性，造成臺北於成為世界城市發展之過程，其產業之發展與結構之調整，呈現與其他世界城市相異之發展型態。

本文結構除第一節前言、第六節結論與建議外，第二節回顧全球化所牽動世界城市產業結構變遷之文獻，並舉出相關論述對說明解釋影響臺北產業結構變遷之不足，說明須進一步將臺北產業結構變遷放置於其世界城市功能發展與限制之架構上來觀察。第三節分析臺北地區產業結構近年之變遷情形，並說明其內 PS 產業之發展與其世界城市功能發展間之關聯，供後續兩節探討制約臺北產業結構調整及世界城市功能發展之基礎。第四節分析臺灣以製造業代工為主之角色參與全球經濟體系，所造成之結果是缺乏新產品研發、市場開拓、及行銷通路與品牌經營之努力，使世界城市理論中所強調之 PS 業，於臺灣之首要都市—臺北，並未發展成為強勁之主領產業；致使臺北地區無法捨棄製造業之結構調整。第五節則論述受限於臺灣特殊之國際政治地位與所衍生之認同政治議題，使臺灣之經濟產業發展政策，於全球佈局中，刻意採取去中國化之作為，如此一方面制約臺灣與全球經濟體系之有效連接，另一方面，亦使臺灣之對外門戶都市 (臺北) 之發展，往往處於進退兩難之情境，束縛其全球性功能之發展及其內部產業結構之有效調整。

## 世界城市產業結構之變遷

透過資訊通訊技術進展之推波助瀾，全球化促進網絡社會之形成，也對空間結構產生衝擊，呈現極度不均衡空間分布及多樣之發展，流動空間 (the space of flows) 之概念也隨之而起 (Castells, 1996)。於產業地景上亦有節點經濟 (economies of conjunction) 之論述，空間上形成不連續，但又具相互連結關係之網絡發展型態，而網絡連結能力具差距之各地區間，形成複雜之空間勞力分工 (Graham, 2002)，連結能力較強之地區，形成所謂之全球或世界城市體系 (Global / World Cities System)，此為全球流動之主要節點與掌控網絡，於此運作架構下，世界城市內部之產業發展與結構之變遷，決定於其於全球分工體系中所扮演之功能或角色之變遷 (Clark, 1996; Friedmann, 1986)。是以，於全球化過程中，經濟活動呈現具有跨界功能互賴之密切關係，跨界經濟活動所建構之生產與流通關係 (production

and circulation relations) 網絡，不只決定廠商、產業與生產跨界能力之影響範圍，也是影響地域 (區域或都市) 經濟發展所驅動發展轉型與內部產業結構變遷的重要因素 (Allen, 1992)。

由 PS 產業主導世界城市經濟發展之型態也逐漸浮現，成為當地經濟發展之驅動力所在，甚至於有論者認為強有力之 PS 部門，事實上並不需要當地之製造業做後盾，同樣也能帶動當地之發展 (Drennan *et al.*, 1996; Williams, 1996)。原因在於：因應全球化，跨國企業之製造生產活動趨向分散式全球佈局，以取得生產成本優勢之利基或便於佔領全球各地之市場。但於此分散化生產佈局過程中，又產生對分散全球各地之營運據點進行統籌規劃與控管之需求功能，對 PS 專業服務之需求因而日益增加，也促使 PS 部門之分工日益細緻與專業化，於 1980 年代起歐美先進國家，及 1990 年代起之亞太各國皆展現明顯之成長 (Sassen, 1991; 2002)。故 PS 產業之快速發展，成為全球化過程中之重要特徵，同時也是用以評判於世界城市體系中所佔有地位或功能之重要指標。換言之，特定城市是否具有足夠之能力以支應跨國企業跨境投資管理工作之所需，便為該地區是否能留住或吸引跨國企業，也是其能否成為全球經濟體系中扮演關鍵角色之重要影響因素。許多全球城市也正呈現以金融及生產者服務業發展為新都市經濟核心，取代傳統製造為導向之經濟重心，成為當地發展之主領性產業，具備驅動當地發展之能力 (Sassen, 2002)。所謂主領性產業，未必以其所佔份額需超過特定比例為要件，紐約於 1987 年，PS 產業提供之就業數約佔 37.7%，1989 年其 PS 部門佔所有經濟部門境外收入之 16.6%，倫敦於 1989 年約佔 40%，Sassen (1991) 與 Frost 及 Spence (1993) 仍認為 PS 產業於此兩都市具主領地位，是否成為主領產業之評斷，除了所佔比例之快速增加外，更重要者在於 PS 部門是否具有全球聯結的掌控能力，包括其輸出性或跨國服務功能、成長性、與企業總部之互動及與生產網絡連結能力等，如此才足以驅動城市經濟及所得之成長，並提升城市本身於全球經濟體系中之影響力 (Drennan, 1992; Edgington and Haga, 1998; Markusen and Gwiasda, 1994; Searle, 1998; Taylor *et al.*, 2002)。

除了 PS 產業快速成長及於經濟發展上扮演之功能提昇外，PS 產業也呈現空間聚集之現象，之所以聚集於大都會區 (尤其是中心地區) 之原因，除了大都會區全球連結能力較強外，更因為於產品需求變動率高及生產技術變動快速之背景下，企業需快速取得消費者偏好之訊息，進行及時之生產技術或製程之創新，才足以領先競爭對手佔領市場，都會區內具高度之複雜性及多樣性優勢，可提供全面性之創新技術來源、各種種類與層次之專業技術、商業訊息及勞工來源，同時具多樣之供應者與行銷網路，且更重要的是：都會區內複雜多樣之社會關係與動態，正可將活力轉化成適當之機制，將生產及其組織整合成一強有力之生產網 (Coe, 1998)。再者，許多大企業之重大決策 (如合併或策略聯盟等) 經常需面對面交易，並且需要許多專業人員之協助，如會計師、律師、設計師、廣告公司，公關公司，管理顧問及財務顧問等。Coffey 及 Bailly (1992) 更認為 PS 為增加取得外部資源及彈性運用生產因素之機會，並追求接近其市場之成本最低點 (愈是非標準化之產品，愈需要取得市場變動之訊息，並且愈依賴不斷之面對面接觸)，多傾向於都市中心區聚集。

於此產業活動擴展，同時掌控功能及 PS 業又呈空間聚集之雙重特性下，都會區成為全球互動與地方社經網之交會處，於其內部亦漸形成規範秩序以引導各參與者之行為，此規範秩序係透過有如合作、競爭及支配等關係 (Camagni, 1995; Hakasson and Johanson, 1993)，經由這些規範秩序，使得彼此間之互動對當地及全球變動之力量極為敏感，一方面對產業空間之需求，受其於全球經濟體系及世界城市階層之地位而定 (可能因力爭上游而改變)，另一方面，產業空間結構是以都會中心為生產、交易

及消費之指揮控制中心，結合其周邊地區成為之嚴密之生產消費網，並以都會中心為其連結世界經濟體系之節點，吸納許多跨國流動之專業精英，故其於世界城市階層地位之變遷過程中，其產業結構及空間分布亦隨之重組，也出現經濟階級極化之現象 (Friedmann, 1986; Sassen, 1995)。

然而，此見解似乎尚未被完全認同，歐美地區之發展模式是否能完全套用於其他地區世界城市，尚有所爭議，至少於有些東亞之世界城市，其 PS 產業尚未成為主領產業，諸如 Daniels (1998) 的觀察發現如此，並解釋亞太之世界城市產業組織型態與運作方式的不同，及運用歐美先進國家的 PS 可能是造成此現象的原因。Hill 及 Kim (2000) 則論述東京及漢城之東亞都市，與 New York 之發展型態不同，諸如國家扮演之角色、經濟運作邏輯、與世界經濟連結之主要追求目標 (提昇企業獲利或提高國民就業率)、中央與地方政府間之互動關係等皆有所不同，產業結構因而也是不同的，故東亞世界城市不必然如歐美都市般，以 PS 發展為其發展之主領產業。王振寰 (2002) 及 Wang (2003) 更進而以臺北的發展，論述世界城市間之差異性，雖支持 Hill 及 Kim (2000) 所說明之東亞都市 (東京及漢城) 與歐美世界城市之發展型態不同，但也強調臺北也有異於 Hill 及 Kim (2000) 所述之東亞世界城市發展型態。

Daniels (1998)，Hill 及 Kim (2000) 及 Wang (2003) 等之論述，雖指出亞太世界城市發展之差異性，惟皆不否認 Friedmann (1986) 及 Sassen (1991; 1995) 對世界城市體系架構與對世界城市功能之描述，也認同 PS 產業對跨國經濟運作中之重要性，與於世界城市產業結構中所扮演之功能。其對世界城市理論有深化上之貢獻，然而對臺北世界城市功能發展之論述尚有下列不足之處，第一，對臺北 PS 產業實際發展情況之分析並不深入，以致欠缺對臺北 PS 產業之發展與臺北甚至臺灣整體產業結構調整間關聯之了解，因而無法探究 PS 產業之成長與臺北世界城市功能發展間之關聯。第二，對 PS 產業於臺北都會區內之空間分布亦欠缺分析，以致對世界城市假說中所述 PS 聚集發展之空間極化現象之驗證亦付之闕如，Wang (2003) 雖認為臺北並無空間極化現象，然而，是否真的如此，則尚待驗證。第三，臺北所面臨的特殊政治氣氛，有可能對臺北世界城市功能之發展有所影響，然而其間之因果關係如何，及如何影響 PS 產業之發展等，亦欠缺具體證據加以支持。第四，除了政治氣氛之特殊性外，是否尚有其他之因素限制臺北 PS 產業之發展，進而制約了世界城市功能之發展，此因素是前述文獻所未論及者，但卻是解釋臺北產業結構變遷之重要因素，甚至於此因素可能也是其他新興工業國都市發展所同樣面臨者。若能對以上四項內涵有更深入之了解，當可進一步銜接與補強 Hill 及 Kim (2000) 及 Wang (2003) 之論述。

初步檢視臺北之發展狀況，發現臺灣於不弱之資訊工業基礎及已成為重要資本輸出國之後盾下，其首善都市臺北似乎應如世界城市理論所述，成為具全球經濟指揮掌控之世界城市功能，吸引企業總部之聚集，產業結構也朝向 PS 產業為主領之模式發展，然而，其 PS 產業似乎並未如歐美地區之世界城市般強勁發展，具備跨國競爭能力 (金家禾，2001b；薛立敏等，1995)，成為帶領臺北經濟成長之主要動力，也因此基於 PS 發展與空間分布所進行之世界城市階層排序之研究中 (Taylor *et al.*, 2002)，臺北之排名未盡理想，落後香港、新加坡不少。PS 產業未成為主要產業，使臺北市本身似乎也無法捨棄製造業，仍努力地吸引高科技製造業之進駐與投資，究竟是何因素造成此特殊之發展模式，是一值得深入探討之議題。

本文並不打算討論臺北與其他世界城市競爭 PS 之發展，是否為其必要或是發展之唯一途徑，主

要目的則是在於深化對臺北世界城市功能發展之了解，及深入解釋其發展與其他世界城市差異之處。造成臺北與歐美甚至亞洲其他世界城市呈現不同發展狀況之原因或許甚多，本文聚焦於論述受兩項因素限制臺北的世界城市功能發展，而影響其產業結構變遷 (尤其是 PS 產業之發展)，第一是與臺灣所採取納入全球經濟體系之模式有關，受到以製造業代工為主要擔任之功能或角色所限制，其所造成之結果是缺乏新產品研發及品牌與行銷通路建立之努力，而無法有效支撐或刺激世界城市理論中所強調之 PS 業之多面向發展。第二項制約是，臺灣於國際間特殊政治地位所衍生許多連結能力 (尤其是政治面之能力) 弱化，及所牽引之兩岸關係及境內政治認同議題，所造成於研訂應對全球化之跨國佈局與經濟發展策略上之爭議與延遲不決，而無法建立共識，研訂明確之方向，邁步地進行產業結構之調整，迎向全球化發展。也正由於此兩項特殊性，造成臺北於成為世界城市發展之過程，其產業之發展與結構之調整，與其他世界城市呈現相異之型態發展。透過此兩項制約因素之探討，或許有助於討論未來臺北產業發展方向，如認為引導其產業結構轉向 PS 業發展，是臺北發展的可能機會，則至少須先克服此兩項限制因素。

## 臺北地區產業結構之變遷

臺北都會區之產業結構發展與臺灣地區之經濟發展背景有密切之關係，臺北甚早起 (自日據時代起) 即已發展為臺灣地區之政經中心，戰後直到 1950 年代末期主要是以接受美援進行進口替代之經濟發展策略，此時期之經濟結構及其空間分佈並未有明顯之改變。

1960 年代初期，因應臺灣經濟發展開始轉向出口導向之發展策略，此改變主要是由於國際政治經濟環境已產生明顯變化，隨著國際生產分工之重組及世界資本主義結構之變化，世界新經濟秩序形成，資本主義跨國企業為降低其生產成本及擴大市場與競爭力，將其生產重組，仍將其研發、設計、行銷、行政管控之功能集中於其企業總部 (核心地區)，但將量產需勞力密集之製造及裝配工作移往開發中國家 (所謂之邊陲地區)，一方面可利用大量之廉價勞工，另一方面，又能將其產品有效地推銷至當地市場 (Clark, 1996)。臺灣當時以內需導向之經濟發展策略也正面臨嚴重之瓶頸，故當局於面臨世界新經濟秩序形成之背景下，開始推動財經改革措施，使臺灣轉變為出口導向之經濟發展策略而納入世界經濟體系中，於此世界經濟體系中臺灣是處於邊陲者之地位，所扮演之角色為擔負低階技術、勞力密集、甚至不具發展性或夕陽產業之製造及裝配工作，以換取資本之形成與累積，由於需要大量之勞工從事生產，其生產地點多為交通方便，接近市場之大都市或都會地區，勞工來源則為農村地區，此大量勞工遷移之結果造成大都市及其周邊市鎮之快速發展及經濟結構之變遷。

此時期臺北市除仍居於臺灣地區之經濟中樞外，臺北都會區更係承受此經濟結構及空間發展快速變遷之最典型地區，以其居住人口成長之情形即可略知其快速成長之情形，臺北都會區 (略以臺北市及臺北縣合計) 之人口數占全臺灣地區人口之比例，由 1950 年代之 15% 左右快速增加，於 1971 年所居人口達全臺地區之 20.9%，1981 年為 25.5%，至 1991 年則達 28.3%。其中又以臺北縣成長最快，其居住人口數占全臺灣地區人口之比例，由 1950 年代之 6% 左右快速增加，於 1971 年所居人口達全臺地區之 8.7%，1981 年為 13%，至 1991 年則達 15.1%。尤其是集中於板橋、新莊、三重、新店、中和、永和、土城及汐止等地區。而這些地區又是於 60、70 及 80 年代初期製造業成長最快速之地區。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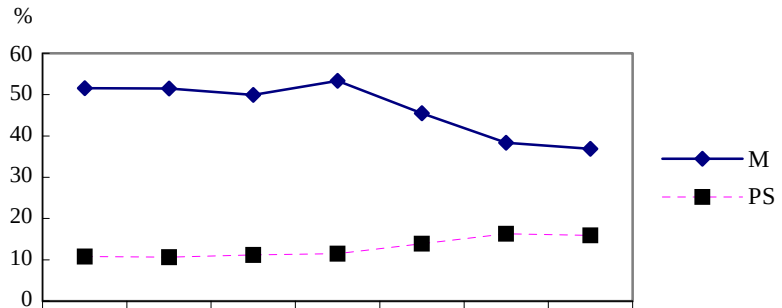
此可說明隨著臺灣納入世界經濟體系之經濟發展策略之運作，臺北及其周邊地區 (都會區) 屬於世界系統理論所稱「邊陲地區」人口集中之大都會地區，因勞工素質較高、行政服務較完備，且基礎設施與交通設施完善等條件，更具備高度之便利性及易於取得廉價之勞力，與接近臺灣國內之最大消費市場，正為核心地區跨國企業分散生產之適當地點，亦是其與邊陲地區經濟交易之空間交會處，因而許多跨國企業前來設廠投資或尋求代工伙伴 (Clark, 1996)。

這種以製造業為主要成長動力之經濟結構持續成長，使臺灣經濟實力逐年增加，至 1980 年代，隨著世界經濟形勢之變遷，臺灣逐漸脫離邊陲地位向上提升，被列為新興工業國或半邊陲地位 (semi-periphery) (Friedmann, 1986)。1980 年代後期起臺灣開始面臨臺幣升值之問題，結合其他如環境保護、勞工權益及地價高漲等問題，使得以往之競爭優勢逐漸減弱，同時周邊之國家亦因應全球化之趨勢，以積極融入世界經濟體系之作為，爭取外商設廠投資。總合這些因素，使臺灣不但對外商設廠投資之吸引力降低，同時境內不具成本競爭力之工業生產活動也開始轉向他國 (如東南亞及中國) 投資，為避免產業外移可能造成之產業空洞化困境，政策上遂致力推動產業升級及吸引國際具高科技、高附加價值及具前景之產業來臺，即為 1990 年代之重要經濟發展政策，所推出亞太營運中心政策，目的在於促使產業結構之提升及提高生產與商業活動效率，達提升臺灣整體經濟實力之目標。臺北都會區因處於臺灣地區之樞紐，是臺灣經濟連繫世界經濟網路之重要節點，其產業結構也深受此影響。

既然 1980 年代起臺灣及其門戶都市臺北之產業發展受全球化衝擊甚大，故有必要對 1980 年以來產業結構變遷之狀況加以了解，本文運用五年進行一次之工商服務業普查資料進行分析，圖 1 及圖 2 顯示臺灣地區之產業結構於 1980 年代後期確實產生了結構上之變遷，1986 年以後製造業所佔之比例逐年下降，而世界城市論述所強調之 PS 部門[2]確實呈現成長現象。但 1996 年至 2001 年之間製造業有呈現結構變動之現象，製造業就業人口比例占臺灣總就業人口之比例略下降 1.4%，但其生產總值所佔比例卻成長 10.2%，達全部產業生產總值的 49.99%。此期間臺灣地區製造業就業人數由 1996 年的 247.6 萬人，增加至 2001 年的 248.6 萬人，五年間的增加率為 0.42%；生產總值由 1996 年的 72,456 億元，增加至 2001 年的 82,192 億元，五年間的增加率為 13.4%。另一方面，生產者服務業的就業人數由 1996 年的 104.5 萬人，增加至 2001 年的 107.5 萬人，五年間的增加率為 2.8%；生產總值由 1996 年的 27,872 億元，增加至 2001 年的 38,782 億元，五年間的增加率為 39.1%。此資料一方面顯示臺灣產業向資訊高科技產業轉型所呈現的結果，同時也顯示，臺灣的產業結構仍然是以製造業為主的型態，PS 所佔比例雖有成長，但不論從其所提供之就業機會及產值，皆不足製造業之 1/2，或是從其輸出與全球聯結能力觀察，也遠不如製造業。

進一步比較整體工商服務業與 PS 產業於臺北都會區之成長與空間分布情形，由表 1 顯示臺灣地區之經濟活動 (廠商、就業機會及產值) 約四成集中於臺北都會區，而臺北都會區內之經濟活動約 50% 分布於臺北之中心區內[3]。表 2 則顯示生產者服務業於臺北都會區之成長與空間分布情形，可明顯地看出臺灣之 PS 產業朝向臺北市集中，尤其是聚集於臺北之中心區內，且聚集者多為較大型、高產值之業者，以 2001 年資料觀察，比較臺北都會區之 PS 業者中 46% 分布於中心地區；但這些業者卻提供全都會區 PS 產業 77% 之就業，佔 87% 之產值。此說明臺灣於產業結構之轉型過程中，成長中之 PS 部門主要是呈現聚集於臺北中心地區之現象，此一方面說明位於臺北之 PS 需部份擔負服務臺灣其他地區製造業所需之功能，全臺 46% 的 PS 就業量，61% 的生產總值集中在臺北市內；另一方面亦顯示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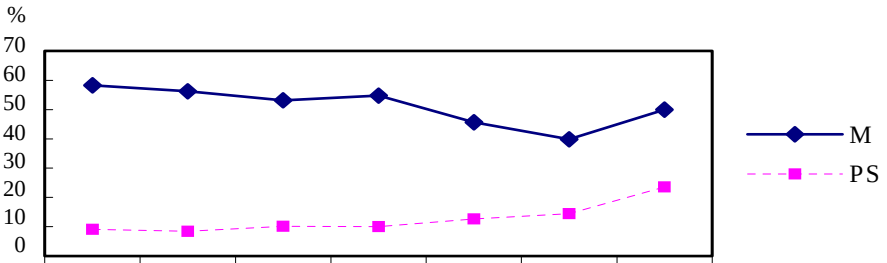
臺灣其他地區之 PS 業者呈相對弱化發展。臺北地區 PS 產業快速成長之趨勢，當然有可能促使臺北內部整體產業結構之變遷，表 3 進一步顯現臺北都會區內產業結構之變動情形，其中 PS 部門所佔比例確實逐年增加，如運輸、倉儲及通信業 (TSC)、金融保險及不動產業 (FIRE) 與專業、科學及技術服務業 (PSTS)[4] 等，但製造業雖有下降仍佔相當之比重，例如當製造業之生產總值佔全都會區生產總值之比例由 1986 年之 49.9% 降至 2001 年之 34.4%，PS 產業卻由 22.5% 上升至 36.4%；當製造業之就業員工數占總就業員工數之比例由 1986 年之 40% 下降至 2001 年之 27.4%，PS 產業卻由 15.3% 上升至 22.1%。




| | 1971 | 1976 | 1981 | 1986 | 1991 | 1996 | 2001 |
|---|---|---|---|---|---|---|---|
| M | 51.52% | 51.43% | 49.92% | 53.36% | 45.52% | 38.37% | 36.90% |
| PS | 10.76% | 10.60% | 11.20% | 11.50% | 13.87% | 16.33% | 15.90% |

資料來源：臺閩地區工商服務業普查 (1971-2001)

**圖 1　臺灣地區歷年製造業 (M) 及生產者服務業 (PS) 就業員工所佔比例**




| | 1971 | 1976 | 1981 | 1986 | 1991 | 1996 | 2001 |
|---|---|---|---|---|---|---|---|
| M | 58.29% | 56.27% | 53.19% | 54.77% | 45.65% | 39.80% | 49.99% |
| PS | 9.12% | 8.41% | 10.17% | 10.06% | 12.64% | 14.50% | 23.60% |

資料來源：臺閩地區工商服務業普查 (1971-2001)

**圖 2　臺灣地區歷年製造業 (M) 及生產者服務業 (PS) 生產產值所佔比例**

**表 1　臺灣產業之空間分布 (所有工商服務業)**

| 年期 | 臺灣地區 | 臺北都會區 | (1) | 臺北市 | (1) | 中心地區 | (1) | (2) |
|---|---|---|---|---|---|---|---|---|
| 場家數　(單位: 千家) | | | | | | | | |
| 1981 | 519.7 | 153.3 | (29%) | 97.7 | (19%) | 78.2 | (15%) | 51% |
| 1986 | 624.7 | 202.7 | (32%) | 123.0 | (20%) | 98.0 | (16%) | 48% |
| 1991 | 760.6 | 264.1 | (35%) | 157.4 | (21%) | 123.2 | (16%) | 47% |
| 1996 | 885.0 | 300.2 | (34%) | 164.0 | (19%) | 124.9 | (14%) | 42% |
| 2001 | 968.0 | 310.2 | (32%) | 169.6 | (18%) | 128.3 | (13%) | 42% |
| 就業人數　(單位: 千人) | | | | | | | | |
| 1981 | 4,401 | 1,588 | (36%) | 989 | (22%) | 724 | (16%) | 46% |
| 1986 | 5,154 | 1,871 | (36%) | 1,112 | (22%) | 836 | (16%) | 45% |
| 1991 | 5,856 | 2,248 | (38%) | 1,388 | (24%) | 1,060 | (18%) | 47% |
| 1996 | 6,595 | 2,537 | (39%) | 1,556 | (24%) | 1,211 | (18%) | 48% |
| 2001 | 6,746 | 2,702 | (40%) | 1,708 | (25%) | 1434 | (21%) | 53% |
| 年生產總值　(單位: NT 十億元) | | | | | | | | |
| 1981 | 3,052 | 1,173 | (38%) | 395 | (13%) | 349 | (11%) | 30% |
| 1986 | 4,838 | 1,598 | (33%) | 891 | (18%) | 679 | (14%) | 43% |
| 1991 | 8,230 | 2,896 | (35%) | 1,817 | (22%) | 1,375 | (16%) | 48% |
| 1996 | 13,746 | 5,478 | (40%) | 3,665 | (27%) | 2,910 | (21%) | 53% |
| 2001 | 16,439 | 7,115 | (43%) | 4915 | (30%) | 4,287 | (26%) | 60% |

說明：(1) 佔全臺灣地區之比例；　　(2) 佔臺北都會區之比例

資料來源：臺閩地區工商服務業普查 (1981 至 2001)

以上資料雖顯示 PS 產業於臺北都會區之成長情形，與所佔比例之逐年增加外，但尚不足以說明 PS 已成為臺北之主領產業，其佔整體都市經濟之份量不但不是最高者，更重要者，臺北 PS 業者全球聯結掌控能力之服務輸出與跨國競爭能力皆不高 (金家禾，2001b；薛立敏等，1995)，尚未能成為帶領臺北經濟進一步成長之主要驅動力。

進一步之分析，可發現臺北 PS 產業之成長，是與臺灣製造業對外擴展，而衍生對相關專業服務業提供服務之需求增加有關，此現象可由製造業部門運用 PS 部門作為生產投入之比例增加來說明，由表 4 之投入產出係數 (I/O 係數) 可略顯示，臺灣諸多製造業部門近年來對 PS 產業之利用，的確有增加之現象。

略比較不同製造業部門與 PS 部門之 I/O 係數，發現高科技產業部門 (如電子產業)，運用 PS 服務之比例並無相對較高之現象，高科技產業之全球連結程度較高，理應較需要專業服務者協助其跨國合作或跨界生產之運行，但 I/O 係數表並不支持此論點。此可能之原因在於高科技廠商雖全球連結能力高，但是以製造代工為主之經濟活動，未必能引發大量之 PS 服務需求，再者，具國際連結能力之廠商，更能由國際市場上取得跨國性之 PS 業者提供服務，未必需要坐落於臺灣或臺北之 PS 業者提

表 2　臺灣生產者服務業之空間分布

| 年期 | 臺灣地區 | 臺北都會區 (1) | | 臺北市 (1) | | 中心地區 (1) | | (2) |
|---|---|---|---|---|---|---|---|---|
| 場家數 (單位: 千家) | | | | | | | | |
| 1981 | 33.8 | 12.8 | (38%) | 9.7 | (29%) | 8.4 | (25%) | 65% |
| 1986 | 59.7 | 25.9 | (43%) | 15.1 | (25%) | 12.3 | (21%) | 47% |
| 1991 | 87.5 | 43.0 | (49%) | 27.2 | (31%) | 21.1 | (24%) | 49% |
| 1996 | 122.7 | 57.5 | (46%) | 33.3 | (27%) | 25.7 | (21%) | 45% |
| 2001 | 129.7 | 60.4 | (47%) | 36.1 | (28%) | 27.8 | (21%) | 46% |
| 就業人數 (單位: 千人) | | | | | | | | |
| 1981 | 489 | 233 | (48%) | 197 | (40%) | 183 | (37%) | 79% |
| 1986 | 588 | 285 | (48%) | 236 | (40%) | 218 | (37%) | 76% |
| 1991 | 808 | 416 | (51%) | 346 | (42%) | 320 | (39%) | 77% |
| 1996 | 1,045 | 522 | (49%) | 424 | (40%) | 389 | (37%) | 75% |
| 2001 | 1,075 | 598 | (56%) | 499 | (46%) | 459 | (43%) | 77% |
| 年生產總值 (單位: NT 十億元) | | | | | | | | |
| 1981 | 391 | 117 | (30%) | 109 | (27%) | 105 | (26%) | 90% |
| 1986 | 616 | 358 | (58%) | 322 | (52%) | 311 | (50%) | 87% |
| 1991 | 1,370 | 785 | (57%) | 703 | (51%) | 674 | (49%) | 86% |
| 1996 | 2,787 | 1,589 | (57%) | 1,390 | (49%) | 1,304 | (46%) | 82% |
| 2001 | 3,878 | 2,586 | (67%) | 2,364 | (61%) | 2,243 | (58%) | 87% |

說明： (1) 佔全臺灣地區之比例；　(2) 佔臺北都會區之比例

資料來源：臺閩地區工商服務業普查(1981 至 2001)

表 3　臺北都會區各產業部門所佔之比例

| | 年期 | 製造業 | 營建業 | TDCD | PS | SPS | 其他 |
|---|---|---|---|---|---|---|---|
| 就業人數 | 1981 | 38.2 | 9.9 | 28.8 | 14.8 | 7.3 | 1.0 |
| | 1986 | 40.0 | 7.0 | 29.5 | 15.3 | 7.2 | 1.1 |
| | 1991 | 31.3 | 7.9 | 33.4 | 18.6 | 8.1 | 0.8 |
| | 1996 | 28.5 | 7.2 | 34.5 | 20.6 | 8.6 | 0.6 |
| | 2001 | 27.4 | 5.8 | 35.6 | 22.1 | 8.6 | 0.5 |
| 年生產總值 | 1981 | 37.2 | 15.7 | 20.1 | 19.8 | 6.4 | 0.8 |
| | 1986 | 49.9 | 6.0 | 13.9 | 22.5 | 4.9 | 3.0 |
| | 1991 | 48.9 | 6.2 | 11.4 | 25.1 | 4.0 | 4.6 |
| | 1996 | 37.4 | 7.9 | 18.4 | 29.0 | 5.5 | 1.8 |
| | 2001 | 34.4 | 5.0 | 17.0 | 36.4 | 5.5 | 1.7 |

說明： (1) TDCD：批發、零售及餐飲業；

(2) PS：生產者服務業，包含：金融保險及不動產業 (FIRE)、運輸倉儲及通訊業 (TSC) 及專業、科學及技術服務業 (PSTS) (或 1996 年之前的工商服務業)；

(3) SPS：社會服務及個人服務業

資料來源：臺閩地區工商服務業普查 (1971 至 2001)

供服務，因為這些業者未必具有足夠之能力進行全球聯結服務，例如科技廠商海外釋股業務，係尋找歐美著名或大型證券業者進行，技術專利權之跨國性訴訟也是尋求國際性律師事務所進行；所謂之傳統性產業 (如紡織、塑化等產業)，甚多已進行跨界生產線建置，對跨界投資及相關控管之工作，可能反而較需要 PS 之服務。

**表 4　製造業部門與商品買賣、金融保險及運輸倉儲通訊 (TSC) 間之 I/O 係數**

| | 運輸倉儲通訊 | | | 企業服務 | | | 商品買賣 | | | 金融保險 | | |
|---|---|---|---|---|---|---|---|---|---|---|---|---|
| | 1991 | 1996 | 1999 | 1991 | 1996 | 1999 | 1991 | 1996 | 1999 | 1991 | 1996 | 1999 |
| 紡織品 | 0.012 | 0.013 | 0.014 | 0.010 | 0.012 | 0.015 | 0.029 | 0.038 | 0.040 | 0.023 | 0.031 | 0.033 |
| 紙、紙製品及印刷 | 0.017 | 0.019 | 0.019 | 0.025 | 0.025 | 0.031 | 0.044 | 0.077 | 0.075 | 0.038 | 0.030 | 0.028 |
| 塑膠製品 | 0.014 | 0.014 | 0.014 | 0.016 | 0.007 | 0.016 | 0.044 | 0.063 | 0.056 | 0.024 | 0.026 | 0.025 |
| 金屬製品 | 0.017 | 0.021 | 0.018 | 0.014 | 0.016 | 0.018 | 0.059 | 0.070 | 0.069 | 0.032 | 0.029 | 0.029 |
| 機械 | 0.020 | 0.022 | 0.024 | 0.019 | 0.017 | 0.020 | 0.065 | 0.066 | 0.074 | 0.024 | 0.025 | 0.024 |
| 家用電器電子產品 | 0.016 | 0.019 | 0.020 | 0.039 | 0.031 | 0.032 | 0.055 | 0.069 | 0.072 | 0.024 | 0.028 | 0.027 |
| 資訊產品 | - | 0.014 | 0.020 | - | 0.014 | 0.015 | - | 0.052 | 0.053 | - | 0.026 | 0.025 |
| 電子零配件 | - | 0.017 | 0.017 | - | 0.021 | 0.020 | - | 0.051 | 0.040 | - | 0.024 | 0.027 |
| 電機及其他電器 | 0.014 | 0.015 | 0.016 | 0.010 | 0.008 | 0.009 | 0.054 | 0.084 | 0.081 | 0.020 | 0.032 | 0.029 |

**資料來源：行政院主計處第三局，臺灣地區產業關聯表。**http://www.dgbas.gov.tw/dgbas03/div6all.htm

至於 PS 產業呈現聚集於臺北地區之現象，是由於企業總部透過對分散各地投資之技術、管理、資訊與資金等之管控，發揮其連結與指揮掌控之能力，故企業總部聚集程度是世界城市功能之指標，臺灣自 1980 年代以來快速成長之對外投資，一直為臺灣政經中樞之臺北，於此功能上無疑地居重要地位，漸發展其跨境投資之指揮掌控功能，不但臺灣企業之企業總部、銀行及金融機構高度聚集於臺北地區，由 2001 年工商服務業普查資料顯示，臺灣地區所有產業共 10,624 處企業總部，其中有 4,993 處設於臺北都會區內 (佔全臺灣地區之 47%)。屬於製造業的企業總部全臺灣地區共計有 5,699 家，其中有 2,645 家坐落於臺北都會區內 (佔全臺灣地區之 46%)，有 1,521 處坐落於臺北市內 (佔全臺灣地區之 27%)。全臺灣地區 PS 產業共有 1,241 處企業總部，其中坐落於臺北都會區者有 648 處 (佔全臺灣地區之 52%)，位於臺北市區內者有 585 家 (佔全臺灣地區之 47%)。全臺灣地區有 539 家金融服務業企業總部，其中有 204 處坐落於臺北都會區者 (佔全臺灣地區之 44%)，位於臺北市區內者有 204 家 (佔全臺灣地區之 38%)。

臺北之對外連結能力亦優於臺灣其他地區，尤其是影響對內及對外連結能力之網際網路接取供應者 (internal service provider, ISP)，及具跨國聯繫性質之衛星通信業與國際海纜電路出租業皆設於臺北，臺灣 76% 之國際快遞集中於臺北地區 (陳宜靖, 1998)；外國金融保險業於臺灣之據點也以臺北為聚集地，而有於其他國家設立分行之銀行，其總部絕大部分集中於臺北地區，使臺北成為企業對外投

資之資金調度與掌控中樞。這些皆足以說明臺北之跨界服務與掌控功能於此過程中逐漸發展，也漸具世界城市之功能，於此過程至少產生對 PS 產業服務之需求，而相對上較大型、高階及具跨國運作能力之 PS 業者，也都集中於臺北地區 (金家禾，2001b)，幫助企業進行跨國業務之運作[5]。

以上分析呈現 PS 部門於臺北之發展情形，說明其與臺北世界城市功能之強化有正向關聯，且呈現於都會中心區聚集之現象，此雖符合世界城市假說之論述，然而臺北於經濟發展上仍然甚依賴製造業，至少 2001 年尚提供臺北市 25.2 萬之就業機會，佔全部就業人數之 14.8%；臺北市的製造業生產總值也佔全體產業的 20.6%。而金融保險及不動產業 (FIRE) 提供之就業機會只占 12.5%，其產值也僅佔全臺北市工商服務業總產值之 8.7%。此說明 Drennan *et al.* (1996)、Williams (1996) 及 Sassen (2002) 等人所觀察之：「以 PS 為主之產業結構，成為當地經濟發展之驅動力所在，甚至不需要當地之製造業做後盾，同樣也能帶動地方發展」之模式，並未出現於臺北。此資料也無法支持 Wang (2003) 對臺北產業結構的論述，認為臺北是以金融服務業之發展為主，與其他歐美世界城市發展的型態較接近，而有異於其他東亞世界城市是以製造業發展為主，而輕視服務業的發展型態。由上述經驗資料顯示，迄 2001 年，臺北之發展大致上較符合 Hill 及 Kim (2000) 所描述之東亞世界城市發展型態，偏重製造生產部門而非 PS 部門。

造成臺北 PS 產業未強勁發展之因素或許甚多，例如與其他地區之跨國企業相比較，臺灣大部分之企業規模皆相對較小，對全球經濟運作之影響力相對較小，再者，有許多企業是以面向大中華圈為經營策略為主，中國式之經商方式重關係而較不重視法律契約關係，導致較不須 PS 專業服務，或許也是一項因素 (Daniels, 1998)，或者是因為發展型國家和工業發展取向，重視的是就業機會之提供所導致。然而，臺北世界城市功能發展之受限，對制約 PS 產業發展之作用力似乎更大，換言之，將臺北產業結構變遷放置於其世界城市功能發展之架構上來觀察，似乎可以較具體地解釋何以其 PS 產業未如預期之發展，也才可能進一步解釋與其他世界城市發展之差距。既然 PS 產業之發展與臺北世界城市功能之強化有關，若能再進一步釐清限制臺北世界城市功能發展之因素，則可了解何以 PS 產業未如其他世界城市般成為臺北之主領產業，由克服制約因素之作為探討臺北之產業發展策略也才有意義。以下兩節分別說明兩項因素深切影響臺北全球性功能發展，而限制其 PS 產業之發展，一是受到臺灣以製造業代工為主之發展模式所限；二是臺灣國際政治地位之弱化及兩岸關係所衍生之政治認同議題，限制了臺灣產業結構之調整及臺北世界城市功能之強化。

## 代工模式之束縛

臺灣自 1960 年代所採取出口導向之工業發展模式以來，即與先進國家廠商建立穩固之供應鏈或代工關係，早期以低廉勞力納入全球經濟體系之策略，扮演低階產品或勞力密集產業生產代工之角色。其後，策略上朝向資訊產業發展，所採取之模式亦是以生產代工為主，由以往利用低廉勞力優勢之發展，轉向比歐美技術勞力成本相對較低廉之方向發展 (廉價腦力)，專長於將產品生產效率提昇至極致，快速擴佔全球資訊零組件、週邊設備及電腦系統產品之全球代工市場。

此種偏重於製造代工之發展模式與思惟，一方面使廠商未積極於品牌、通路之耕耘，對帶動相關 PS 產業成長之助益並不大，由於對產品鍊之前後段工作較忽略，而前段之產品開發及後段市調行銷工

作卻可帶動眾多 PS 產業之發展，這些工作由下單廠商 (品牌廠商) 於其座落地區 (美、日、歐) 所熟悉之 PS 業者執行，而非交由臺灣之業者，如此使臺灣 PS 產業之市場規模小，市場小又多為單打獨鬥之中小型業者為主，也不易形成具高度知識密集之 PS 產業網絡，當然難以進入國際市場競爭，進而促使 PS 業成為輸出性之產業，成為全球連結及管控之重要行為者，及成為帶動經濟成長之主領產業。

檢視以往於臺灣地區發達之產業 (主要是屬製造生產面向上)，如製鞋、紡織、玩具、製傘等產業，於臺灣廠商將生產線外移過程中，較少有提昇至品牌建立及全球銷售通路之成效，外移廠商仍扮演製造代工之角色，所能衍生之 PS 服務需求極為有限，由臺灣境內並未明顯出現有關這些產業之產品設計、行銷、市場調查、產品展示、顧客服務、廣告企劃等功能之發展，便足以印證。另一方面，產業發展政策也多重製造而忽略 PS 產業之發展，並未積極鼓勵與引導 PS 產業之發展 (金家禾，2001b)。

1980 年代以來，外部因東歐、中國及越南等國家納入全球分工體系，與東協新興國之發展，快速吸納勞力密集產業，對原來以代工參與全球分工之臺灣形成壓力，尤其是中國以更低廉之生產成本快速地替代其他亞洲新興國之勞工密集產業；臺灣內部又因社經環境改變，生產成本提高、環保意識高漲，使得處於全球激烈競爭壓力下之臺灣出口導向廠商，不得不將勞力密集之生產活動／生產線，移往成本更低廉之地點，於此背景下，政策上也才於 80 年代末開始注意朝向技術提昇與附加價值較高之服務業發展，乃有「促進產業升級」、「亞太營運中心」、「全球運籌中心」、「知識經濟方案」之政策。

然而，臺灣對外投資 (主要於東南亞及中國) 之模式，對促進臺灣本身 PS 成長之效果亦須加以解析，由於臺灣企業多採取於投資地點設置其本身或關係企業之分公司或衛星工廠，形成臺灣之跨國生產線，其跨境投資之目的在於運用當地低廉之勞力與土地進行生產，似乎只是製造代工模式之延伸而已，此模式有別於歐美工業先進國已是生產全球化的廠商為主，自己本身不再從事量產製造活動，採取將生產外包給生產成本低廉地區當地廠商之方式運作。於此運作模式下，海外生產基地與臺灣母廠尚維持緊密之網絡關係，甚至造就「臺灣接單，海外生產」之分工方式 (周志龍，2000)，雖創造部分對跨界生產指揮與運籌功能之需求。然而，此種方式因為與投資地點當地廠商間之生產網絡關係薄弱，且不以經營當地市場為主要目標，對因生產外包所衍生之跨國性 PS 業 (如廠商徵信、法律、會計、生產監控及品質管制等)，及開拓對外投資地區當地消費市場所需之服務，如市場調查、廣告、企劃、通路及銷售點建置、顧客服務等之需求未必很多，如此，當然不易使成長中之跨國性製造業生產投資行為，具有促進臺灣內部 PS 產業成長之效果。

受限於以往納入全球分工體系扮演製造／代工功能之發展模式，於建立品牌及於產品之全球銷售、通路及市場經營上一直未如製造業生產技術成功之績效，此造成臺北與歐美世界城市於 PS 產業發展上呈現差異，歐美企業掌握產品品牌及行銷管道，諸如產品標準、專利、品牌、行銷通路及顧客服務等皆掌握於其手中，不但能主導產業之遊戲規則及市場，創造公司最大利潤，其產品 (未必全部自行生產) 或品牌之市場佔有率越高，便愈能驅動其境內 PS 產業之成長。反觀，臺灣缺乏自有產品品牌及行銷管道，作為代工者，其市場佔有率 (生產量) 雖提高，卻未必能帶動境內 (臺北) 其他相關之服務業如行銷企劃、廣告、市場調查、全球通路物流、顧客服務、法律及會計服務等 PS 產業之同步成長。

以製鞋業為例可說明此狀況，臺商運動鞋廠商是國際知名品牌如 NIKE、Addidas 之主要代工廠，NIKE 及 Addidas 因主導品牌及行銷通路，不但創造公司高額利潤，也帶動諸如行銷企劃、產品代言、

廣告、市場調查、通路物流、顧客服務、法律及會計服務等 PS 產業之同步成長，反之，臺灣代工廠雖已達 ODM 能力，廠房規模也高達數萬人員工數，但卻甚少能引發上述 PS 產業之成長，代工廠商本身於全球市場上往往沒沒無聞，甚至根本未上市，對產品價值鍊掌控及生產網之建構，幾乎是由品牌廠商主導之客戶驅動 (buyer-driven) 模式。

宏碁與其他電腦代工廠商對 PS 業者提供服務之差異，也是另外一個例子，可說明代工廠商對 PS 業者之服務需求較低，宏碁因為有於自創品牌上之經營，對於產品定位、行銷企劃、廣告、市場調查、通路物流、顧客服務等相關服務業之運用，明顯高於其他代工大廠。

進一步與東亞世界城市相比較，亦可說明臺北 PS 產業之弱化發展與臺灣製造代工之角色有部分關聯，香港及新加坡已多將製造生產外移，而致力於服務業之發展，PS 產業之發展明顯優於臺北，也有較強之全球聯結能力，提供跨國企業較佳品質與較多元化之服務，故能吸引較多跨國企業之進駐，較具 Taylor 等 (2002) 所言之掌控能力，於全球城市之排名上也優於臺北。而日、韓經濟雖與臺灣相同仰仗製造業，但其走的是品牌途徑，並以產品行銷全球為目標，故東京及漢城 PS 產業成長快速，尤其是通路 (如日本之商社)、顧客服務及廣告行銷相關之 PS 部門，發展上也優於臺北 (Edigington and Haga, 1998; Park and Nahm, 1998)。

代工者之角色及驅動 PS 產業發展之程度較低，對臺北 PS 產業未如歐美地區世界城市般之強勁發展，其產業結構也未順利向 PS 調整，受限於代工角色參與全球經濟之模式，可提供部分之解釋。

發展成為金融中心、研發中心、營運中心或運籌中心，轉向注重 PS 產業發展之努力，固然是臺灣未來可能之發展機會，然而，受以往參與全球經濟分工之製造業代工角色所限制，加上以往產業發展政策多忽略 PS 產業 (金家禾，2001a)，無法形成具國際競爭力之 PS 產業，即使如推動之全球運籌中心，亦因 PS 產業之相對弱勢，人力、技術及資訊之國際聯結能力比不上鄰近之香港及新加坡，而缺乏明確之定位與具體策略 (蘇雄義，2001)。故有必要先考量所面臨的限制及如何克服束縛。

首先，欲從代工角色向上提升，廠商面臨之挑戰甚大，一方面須進入已被佔領之市場進行競爭，另一方面要有足夠之研發能力，創造出新產品及專利，才能擺脫受專利權及生產技術之束縛。策略之一是在於全球產品市場中，尋求較有機會建立產品品牌之領域，及投入足夠之資源建立全球或部分主要市場之通路，並努力突破原佔有市場者 (他國之跨國企業) 之排擠、封鎖甚至於圍剿，如此才能使臺灣實力不弱之製造業活動，於對外投資生產過程中，仍依賴境內 (臺北) PS 之協助，進行其跨國指揮掌控之工作，帶動如行銷企劃、廣告、市場調查、全球通路物流、顧客服務、金融、管理諮詢、專利權法律服務與財務管理等之同步成長。為達此，亦有賴政府配套之作為，創造優良之研發環境與鼓勵制度，引導企業長期努力進行研發創新及建立品牌，並將此核心工作留置於臺灣。

其次，努力吸引國際量級 PS 之進駐，提昇 PS 業者之跨國網絡聯結與越境營運能力，諸如鼓勵同業間及異業間之整合，進行互相支援與學習，以提昇專業技術能力與對外聯結能力，並透過積極了解 PS 產業之營運與其空間區位需求，採取積極創新之方式供應及滿足業者發展所需之空間，甚至於使之形成具高度知識密集之 PS 產業網絡，如此才能對眾多境外投資之廠商提供高質的服務，甚至進入國際市場與他國之 PS 業者競爭，使 PS 業自身便能成為輸出性之產業，PS 產業也才有機會大幅成長，成為帶領臺北經濟成長之重要產業部門，並強化臺北之世界城市機能。

再者，具國際營運能力的專業人力培育及引進也甚為重要，以往專注於代工之發展模式，造成對

PS 產業之忽略，不但呈現服務等級低與缺乏強力整合之情況，亦使專業能力及人才之培育上皆為不足，尤其缺乏能充分掌握國際市場現況及可能變動之專業人才。加上臺灣 PS 業者中有許多行業 (如會計師、經紀人、律師) 受臺灣專業技師制度之保護，國外專業人員無法於臺執業，致使於缺乏動機引進國外專業人員之情況下，不僅失去與國外專業技術交流與學習之機會，且 PS 業者以往因大都專注於國內市場之耕耘，缺乏開創國際市場之動力，致使國際化能力不足。若以使 PS 產業發展成為輸出性產業並進入國際市場競爭為目標，及支援臺灣製造業於全球市場中建立品牌，須考量面對全球化之競爭，產品生產、銷售及售後服務皆以全球為導向，但面臨不同地區市場之特性差異與消費者偏好不同，需對當地之法令、制度、文化、風俗民情、消費習性及偏好等有深入之了解，才能擬定適宜之生產、行銷與廣告策略與行動，此皆需有專業能力人才養成之耕耘。

## 弱化之政治地位與兩岸關係之制約

另一項制約因素來自於臺灣退出聯合國後，所處於之弱化國際政治地位，依 Smith 及 Timberlake (1995) 之論述，可透過各都市間功能之連結關係，來架構世界城市間之互動與階層關係[6]，此架構之要素有型態 (form) 與功能 (function) 流 (flows)，型態流包含人、物資及資訊之流動；功能流則包含經濟、政治、文化及社會之流動。型態與功能流組合成十二種型態之流動 (表 5)。臺灣弱化之國際政治地位，顯然直接影響政治面功能之流動能力，並間接影響文化、經濟及社會功能面之流動能力，對發展跨境營運能力之 PS 產業發展形成制約之作用，因為許多 PS 之服務與運作涉及公部門之行政服務及法令規章，有較佳之政治、社會與文化連結能力，有助於 PS 業務之擴展與運行。此項弱化之國際政治面功能之流動能力，對臺北於發展跨境 PS 之作為上，多少形成限制性之力量，也使得對產業向外流動之發展政策制訂上偏向保守態度，這項限制性力量也是全球世界城市中所獨特者。

**表 5　世界城市功能流組合成型態**

| 功能 | 型　　式 | | |
|---|---|---|---|
| | 人員 | 物資 | 資訊 |
| 經濟 | 勞工、管理人員、<br>律師、顧問 | 資金<br>商品 | 經濟交易之電話、傳真、<br>電報、技術轉移、廣告 |
| 政治 | 軍隊<br>外交人員<br>社工人員 | 武器<br>外援 | 談判<br>協商<br>條約 |
| 文化 | 交換學生<br>文化團體訪問 | 畫<br>藝術品 | 影音產品 |
| 社會 | 家庭<br>紅十字會<br>社區組織者 | 匯款<br>外援 | 信件、郵卡<br>電話 |

資料來源：Smith and Timberlake, 1995.

弱化之國際政治地位更牽涉海峽兩岸之認同政治關係，臺灣努力發展國際空間，與中國極力封鎖之間，形成兩岸關係之緊張，也使島內政黨甚至居民族群間形成統獨之爭。兩岸就地理上而言，臺灣

為鄰近中國之一個離島，兩個獨立之空間，多少有疏離感，然而，就人文上而言，同文同種且長久以來深受中原文化之影響，故基本上屬於制約甚至依附於中國，而處於相對弱勢之狀況。1949 年之後因國共之分治及美蘇兩大陣營冷戰對抗之國際關係，使兩岸處於分離、不接觸與對立達 30 年，當時臺灣成為以美國為主之資本主義集團盟友，也因此與西方進行連結，國民政府之經濟政策亦採取向外式之國際連結模式，參與國際分工。於此情況下，臺灣國際化之時期相對上比中國早，經驗較豐富，當然於其後之全球化趨勢下，於納入全球經濟體系過程中也比中國較具優勢。

於此地理及歷史背景下，加上全球化之影響，使得兩岸處於奇特之關係：全球化及資訊通訊網路技術之進步，使得空間阻隔力縮小，臺灣與全球連結能力於相對優勢之情況下，使其社經文化上之選擇性大為提昇，且內部自我之創造能力亦不斷提昇，使得中國對臺灣於地理空間上及文化上之制約力量減弱，然而中國對臺灣之連結並非全然消失，一方面，部分中國來臺民眾 (榮民) 對家鄉之依戀及認同；另一方面，某些優勢則在增強中，例如經濟及市場之吸引力上，中國融入全球經濟體系後，以低廉之土地、勞力等之生產成本，發揮磁吸效應，及廣大市場之開放，對臺灣廠商，尤其是製造廠商，具相當大之吸引力，依經濟部之調查，於 2001 年臺灣對外投資之製造業中，有 72.9% 之廠商在中國進行投資，同時期，對外投資之製造業者中，透過位於中國之工廠出貨者，所佔之廠家比例為 58.9% (工商時報，2002 年 9 月 30 日)，可見於製造業活動上，臺灣與中國間已形成強烈之連結關係。於此背景下，臺灣內部對兩岸關係之意識上，一方面有情感及市場吸引之認同因素，另一方面，又有受中國威脅 (政治及經濟上) 之危機論，或因全球化所牽引之文化多元及自主意識形成，而形成不同群體間因所持觀點之不同，具統獨爭議，使兩岸關係呈混沌不明之狀態。

此混沌不明之兩岸關係，伴隨著臺灣在民主化過程所帶來本土化之情結，形成政策上針對中國所進行「去中國化」之作為，例如，以鼓勵廠商「南進」取代「西進」，並以連結日本與美國之發展軸線，使臺灣處於東西發展軸線與對東南亞發展軸線之合縱連橫十字核心，達與中國化抗衡之策略。然而南進政策因亞洲金融危機而破局，依循雁形理論連結日本與美國之發展軸線，亦因日本面臨經濟泡沫破滅後所處於長期不景氣而受挫；反倒是中國經濟之連年成長，為全球表現較佳之經濟體，不但漸取得製造業全球工廠之地位，甚至於部分之 PS 產業亦於全球重量級企業之進駐與競爭下，呈明顯增長[7]。難怪此兩岸政策被部分論者批評：期望透過對人與地之重新改造，建構新的「臺灣意識」甚或「新國家」之作為，反而使臺灣陷入內縮型之發展型態，無法使臺灣在國際間開拓更廣之發展空間 (王崑義，2001；黃俊傑，2000)。

「去中國化」或冠以本土化名義之作為，在政策上一直未明確將中國市場視為全球經濟之一環加以經營，甚至刻意對之漠視，但在中國漸與世界接軌，為 FDI 之最大吸引地，成為世界工廠之同時，臺灣之經濟產業發展便漸出現捉襟見肘之窘境。第一，臺灣以往迄今於全球經濟體系中所扮演之製造代工基地之角色，正面臨中國以世界工廠定位之方式搶奪，臺灣之廠商亦不斷地前往中國設廠投資。第二，漠視中國市場使臺資廠商失去利用中國市場建立品牌及行銷通路之機會，使得原來因重製造而輕服務業之發展政策，未形成強健發展之 PS 產業，也失去進一步擴展之機會。戒急用忍政策下，並未明確將中國市場視為全球運作之一環，加以積極開拓，此舉不利於臺灣 PS 業務之拓展，例如未開放不動產業、金融、證券及保險業赴中國投資，無法使 PS 業者隨國內製造業之赴中國投資而擴展於中國之業務。弱化之臺灣 PS 產業無法對投資中國廠商提供充分之協助，一方面增加臺商於中國投資

之困難度與風險，如需與當地不熟悉之 PS 業者接洽設廠事宜 (如取得土地進行廠房興建)[8]，亦影響其財務調度與資金運用能力 (例如兩岸直接通匯未開放，影響資金流動)，同時亦對本國 PS 業向外擴張發展形成限制，不利臺灣發展成為具跨國資金流動重要節點與影響力之功能，弱化之對外 (尤其是對中國地區) 金融服務及 PS 服務網，無法滿足巨額對外投資設廠之需求，換言之，為數眾多之對外投資設廠廠商，與少量之對外金融機構及 PS 服務業者間之不平衡發展，當然使臺灣 PS 業者於全球競爭上處於劣勢。政策上未開放金融及部分 PS 服務業赴中國投資，於許多業者係透過第三地前往之情況下，間接以臺灣之資金及資源協助與強化該第三地之 PS 業者發展，使之回過頭來又成為臺灣之強烈競爭對手。

經貿政策上雖由「戒急用忍」轉為「積極開放、有效管理」，但由雖之而來之八吋晶圓廠、高科技人才前往中國之管制、漢語或通用拼音爭議等看來，研議中推行實質之三通或許可減輕產業之成本及有助於兩岸生產鏈之整合，卻無法消弭對中國認同之爭議，甚至有政府高層官員提議對前往中國投資之臺商課特別之稅捐 (國家安全捐)，企圖藉此對中國投資熱降溫，此或許是追求全球化下又受限於臺灣意識認同束縛之特殊情境。政治與經濟發展上之不同調，不但影響臺北產業結構之調整，也制約了全球連接能力之發展。

另外，臺北與臺灣其他地區間之選民結構，可能由於政治認同之不同而形成差異，近年來市長大選之結果，皆是由不同於中央政府執政黨之候選人所獲勝，此多少影響臺北為臺灣連結全球門戶都市功能之運作[9]，加上中小型企業為主之臺灣製造業特性，於向外設廠過程，未必需要臺北作為其對外投資或全球佈局之掌控中心，形成臺北與臺灣其他地區間有失連 (de-linking) 之潛在危機。加上前節所述以代工為主要發展型態之特性，難以造就強烈產業連結之黏稠性，如此限制臺北之產業結構無法隨產業全球佈局之過程，全力轉向發展具全球連結之高階生產者服務業，成為帶領經濟成長之主要產業，而此又回過頭來造成臺北必須保有相當部分製造業活動之壓力，以提供就業機會及保有經濟所得，故需與其他縣市競爭吸引製造生產活動。

總之，以經濟全球化之向度思考，臺灣都市 (特別是臺北市) 漸成為資本輸出地區之後工業都市 (post-industrial cities)，其主要經濟活動理應朝向以資訊及知識處理為主之產業活動上發展，將中國視為全球市場之一，利用中國作為全球工廠佈局之一部份，使原本多為中小企業之廠商得以擴大規模，進而於中國市場建立品牌、通路並佔有市場，及利用中國市場為基礎，逐步進入世界市場，成為真正之跨國企業，如此才能與先進國家現有之跨國企業競爭逐鹿世界市場。然而，受制於特殊之兩岸關係及所牽涉之認同議題，制約了得以跳脫製造代工角色向上提昇之機會與動力，也正因如此，須回頭採取較保守之態度，企圖努力保有代工技術之領先，並透過政治力量限制先進生產技術及高科技人才前往中國地區，使得臺灣得以保持技術上之領先。政治與經濟朝不同方向發展之拉拒力量，無疑地是影響臺北產業發展與結構調整之重要因素。

## 結論與建議

雖然 PS 產業於臺灣呈現快速發展之現象，臺北也成為全臺地區 PS 產業之主要聚集地，但臺北之產業結構調整，與其他世界城市轉向以 PS 為主領產業部門之發展情況並不完全相同，至少仍然需依賴相當之製造業提供就業機會。造成此與其他世界城市相差異之現象，實與臺北世界城市功能發展之受限有關，本文說明至少有兩項重要因素限制了臺北世界城市功能之發展，而影響其 PS 產業之發展，一是臺灣主要係以代工角色參與全球分工，二是受制於弱化之國際地位及所牽扯之兩岸關係與認同議題。本文之分析也略說明兩者之間多少具有相互影響關係，至少弱化之國際地位與認同議題約束對中國市場之開拓，使臺灣廠商難以跳脫製造代工角色向上提昇，因而產業政策上形成不可輕言捨棄具優勢之代工角色，甚至於需與已成為世界工廠之中國競爭代工訂單，如此對臺北 PS 之發展及世界城市功能之提升皆有所影響。兩項因素何者較為重要，或兩者同樣重要，似乎難以評斷，香港可以棄捨代工甚至於不需工業生產，全力發展 PS 及強化其全球連結功能，臺北則因兩岸政治因素之制約，現階段也難以如此做，政治與經濟發展議題間原本就相互牽連，如何解開此連環套實有待後續研究。

本文結論可深化世界城市理論之論述，說明世界城市產業結構調整雖受全球化力量所驅動，但是，因為各世界城市於全球經濟體系中所扮演之角色與功能有所差異，以致不同都市間之產業結構未必相同，是以，對個別世界城市產業結構調整之認知，尚須由其世界城市功能之發展狀況及發展之制約因素深入檢視，如此，才能對世界城市間產業結構變遷之差異性，加以深入了解，並較能具體解釋其間差異之本質。

至於對臺北產業發展方向之政策意涵在於：正因 PS 產業尚未強勁發展，故 PS 產業於臺北仍有相當之成長空間，然而，須有積極之策略及作為去克服臺北世界城市功能發展之限制因素，才能有效促進 PS 產業之升級與發展。

如何克服本文所論述之兩項制約因素？下列建議或許有助於強化臺北 PS 產業發展之機會：首先是需改變以往偏重製造業發展之作為，而增加對 PS 產業發展之關注，如滿足 PS 產業發展之各項需求，對高階 PS 業者發展提供具體之獎勵與協助，強化知識基礎之氛圍環境，使臺北發展成具創造性之都市，以支援 PS 產業之發展 (Ache, 2000)。其次是藉由中國市場，建立具研發、創新及品牌與通路之產業，逐漸發展成具全球競爭力之跨國企業，以擺脫製造生產代工為主之角色，向產品研發、品牌經營及顧客服務端發展，具商品鍊整合之能力。為達此，尚需進一步強化國際連結之能力，如透過城市外交及妥善運用位於臺北市內之各國經貿文化代表處之連結網絡，與相關各國建立多層面之互動關係，彌補受國際政治面連結能力薄弱之限制，並努力改善兩岸關係，唯有於認同政治層面努力，強化國際連結能力與解決兩岸混沌不明之關係，才能為臺灣於全球經濟體系中爭取更有利之地位，臺北也才能於世界城市體系中扮演更積極與更具主導性之角色，其產業結構之調整也將更快速與順遂。

臺北市與中央政府及其他縣市建立協力合作之關係甚為重要，臺灣各地所面對的是來自全球之競爭壓力，而非彼此間之相互競爭，從中央至各級政府有必要認知強化臺北之世界城市功能是攸關臺灣整體之全球競爭力及未來之發展前景，唯有臺北具備強健之全球連結能力及指揮掌控功能，才能帶領臺灣面向全球競爭，臺北與其他縣市或都市採取功能互補之模式，才是適宜之策略，於此互補式發展模式下，至少臺北可調整其產業發展政策，轉向注重對服務型及知識型 (PS) 產業之引入及發展，而非量產型製造業之發展，甚至於可宣示鼓勵製造業移向外圍縣市，明確建立與臺灣其他縣市之分工模式，由臺北市提供高品質及全方位之 PS 服務，及建立平臺提供製造與商貿活動之資訊，協助其他縣

市之產業升級及對外連結之服務，如此一方面可免除與其他縣市相互競爭製造業之對立關係，又可避免與其他縣市失連之潛在危機。於臺北向上提昇，發展具強健全球連結能力及指揮中心功能之同時，其他縣市除了可利用臺北協助其與全球連接外，亦可吸納臺北因產業結構調整，徹底轉向服務經濟（特別是與指揮掌控有關之 PS 產業）發展時，所逐漸釋出之製造業活動，臺北有必要讓其他縣市明瞭，此種分工互補之發展模式，對彼此有利而無害。

## 謝　辭

感謝本刊匿名審稿人所提供之寶貴建議，使本文之架構及內容更趨完善，惟文中如有任何遺漏或錯誤仍為作者之責。

## 註　解

1. PS 產業包含：設計、法律、會計、建築及工程技術服務、管理顧問、經紀、市場調查、資訊服務、廣告企劃、行銷、公關、國貿、運輸、通訊、研究發展、商品經濟、財務、金融、保險及不動產業　等行業（Clark, 1996; Drennan, 1992; Friedmann, 1995）。
2. 以下分析是將工商服務業普查中行業分類之運輸、倉儲及通信業、金融保險及不動產業與專業、科學及技術服務業（1996 年以前為工商服務業）歸為 PS 產業。
3. 臺北都會區範圍略以臺北市、縣為界，臺北之中心地區含臺北市之松山、信義、大安、中山、中正、大同及萬華區。
4. 1996 年之前的工商服務業普查的大分類為工商服務業（BS）。
5. 有調查顯示除臺北部分業者外，臺灣其他地區之 PS 業者普遍呈現弱化之全球連結能力（金家禾, 2001b）。
6. Appadurai (1990) 及 Knox (1995) 亦有類似之說法。
7. 以廣告業為例，如上海及北京之一級都市，近年來由於眾多國際級廣告商之進駐及相互競爭，使原本落後甚多之廣告業，現在不論創意及製作水準已大為進步，甚至不輸臺灣（奧美廣告呂經理, 2002 年 09 月 19 日）。
8. 許多軟體業者打算進入中國，運用當地充沛之軟體設計人力，進行兩岸軟體產品開發之分工，但因受限於其本身之規模及專業，無法獨立完成於中國範圍廣闊地區尋找合適之地點，空間之取得、進行法令之了解、人力之僱用及優惠條件之協商等繁雜但又極為重要之工作，但又不易於臺灣找到合適之 PS 業協助進行這一系列之服務，政府亦未開放業者可赴中國開發工業區（世正開發楊經理及資訊軟體協會謝主任，2002 年 9 月 25 日）。
9. 中央政府將重要活動移到其所執政之縣市舉辦，或其他縣市抵制臺北之活動，例如觀光局所辦之元宵燈會活動移往高雄；2001 年臺北推動國際文化交流之「亞太文化之都」活動，邀請世界 15 城市及臺灣 18 縣市參加，遭民進黨縣市抵制。

## 引用文獻

王振寰 (2002) 東亞世界城市的不同路徑：漢城與臺北，**臺灣社會研究季刊**，47: 85-139。

王崑義 (2001) 新世紀以來兩岸的全球擴展：全球化與本土化的思辯與行動，廣州中山大學亞太研究中心：21 世紀亞太地區安全與合作研討會，2001 年 07 月 21 至 23 日。

周志龍 (2000) 兩岸三通、全球化與臺灣經濟圈的再結構想像，**理論與政策**，14 (4): 1-36。

金家禾 (2001a) 競爭力與產業用地政策，**經設法制論叢**，27: 215-245。

金家禾 (2001b) 全球化與臺灣都會區生產者服務業之發展，**都市與計劃**，28 (4): 495-518。

黃俊傑 (2000) **臺灣意識與臺灣文化**，臺北：正中書局。

陳宜靖 (1998) **臺灣主要都市全球城際資訊網絡之研究**，中興大學都市計劃研究所碩士論文。

薛立敏、杜英儀及王素彎 (1995) **臺灣生產性服務業之發展與展望—國際比較研究**，臺北：中華經濟研究院。

蘇雄義 (2001) 全球運籌與物流之發展芻議—空運觀點，**民航季刊**，3 (1): 1-29。

Ache, P (2000) Vision and creativity-challenge for city, *Futures*, 32: 435-449.

Allen, J. (1992) Service and the UK space economy: regionalisation and economic dislocation, *Transactions Institutions of British Geographers*, 17: 293-305.

Appadurai, A. (1990) Disjuncture and difference in the global cultural economy. In: Featherstone, M. (ed) *Global Culture: Nationalism, Globalization and Modernity*, Newbury Park CA: Sage, 295-310.

Begg, I. (1999) Cities and competiveness, *Urban Studies*, 36 (5/6): 795-809.

Boddy, M. (1999) Geographical economics and urban competitiveness, *Urban Studies*, 36 (5/6): 811-842.

Camagni, R. (1995) Global network and local milieu: towards a theory of economic space. In: Conti, S., Maleck, E. and Olinas, E. (eds) *The Industrial Enterprise and Its Environment: A Spatial Perspective*, Hants: Avebury, Aldershot, 195-214.

Castells, M. (1996) *The Rise of the Network Society*, Oxford: Blackwell.

Clark, D. (1996) *Urban World/Global City*, London: Routledge.

Coe, N. (1998) Exploring uneven development in producer service sectors, *Environmental Planning A*, 30:2041-2068.

Coffey,W. J. and Bailly, A. S. (1992) Producer service and system of flexible production, *Urban Studies*, 29 (6) , 857-868.

Cox, K. R. (1995) Globalisation, competition and the politics of local economic development, *Urban Studies*, 32 (2) : 213-224.

Daniels, P. (1998) Economic development and producer services growth: the APEC Experience, *Asia Pacific Viewpoint*, 39 (2) : 145-159.

Douglass, M. (2000) Mega-urban regions and world city formation: globalisation, the economic crisis and urban policy issues in Pacific Asia, *Urban Studies*, 37 (12) : 2315-2335.

Drennan, M. (1992) Gateway cites: the metropolitan sources of US producer service exports, *Urban Studies*, 29 (2): 217-235.

Drennan, M., Tobier, E. and Lewis, J. (1996) The interruption of income covergence and income growth in large cities in the 1980s, *Urban Studies*, 33 (1) : 63-82.

Edgington, D. W. and Haga, H. (1998) Japanese service sector multinationals and the hierarchy of Pacific rim cities, *Asia Pacific Viewpoint*, 39 (2) : 161-178.

Friedmann, J. (1986) The world cities hypothesis, *Development and Change*, 17: 69-74.

Friedmann, J. (1995) Where we stand: a decade of world city research. In: Knox, P.L. and Taylor, P. (eds) *World Cities in a World-system*, Cambridge: Cambridge University Press, 21-47.

Frost, M. and Spence, N. (1993) Global city characteristics and central London's employment, *Urban Studies*,

30 (3): 547-558.

Graham, S. (2002) Flowcity: networked mobilities and the contemporary metropolis, *Journal of Urban Technology*, 9 (1): 1-20.

Hakasson, H., Johanson, J. (1993) The Networks as governance structure: inter-firm cooperation beyond markets and hierarchies. In: Grabher, G. (ed) *The Embedded Firm: On the Socio-economics of Industrial Networks*, London: Routledge, 35-64.

Hill, R. C. and Kim, J. W. (2000) Global cities and developmental states: New York, Tokyo and Seoul, *Urban Studies*, 37 (12) : 2167- 2195.

King, A. D. (1990) *Urbanism, Colonialism and the World-Economy, Cultural and Spatial Foundations of the World Urban System*, London: Routledge.

Knox, P. L. (1995) World cities in a world-system. In: Knox, P.L. and Taylor, P. (eds) *World Cities in a World-system*, Cambridge: Cambridge University Press, 3-20.

Markusen, A. and Gwiasda, V. (1994) Multipolarity and the layering of functions in world cities: New York city's struggle to stay on top, *International Journal of Urban and Regional Research*, 18 (2) : 167-193.

Park, S. O. and Nahm, K-B (1998) Spatial structure and inter-firm networks of technical and information producer services in Seoul, Korea, *Asia Pacific Viewpoint*, 39 (2) : 209-219.

Porter, M. (1998) *The Competitive Advantage of Nations.* London: Macmillan.

Sassen, S. (1991) *The Global City: London, New York, Tokyo*, Princeton, NJ : Princeton University Press.

Sassen, S. (1995) On concentration and centrality in the global city. In: Knox, P.L. and Taylor, P. (eds.) *World Cities in a World-system*, Cambridge University Press.

Sassen, S. (2002) *Global Networks: Linked Cities*, London: Routledge.

Searle, G. H. (1998) Changes in producer services location, Sydney: globalisation, technology and labour, *Asia Pacific Viewpoint*, 39 (2): 237-255.

Smith, D. A. and Timberlake M. (1995) Conceptualising and mapping the structure of the world city system, *Urban Studies*, 32 (2): 287-302.

Taylor, P. J. (1997) Hierarchical tendencies amongst world cities: a global research proposal, *Cities*, 14 (6) : 323-332.

Taylor, P., Walker, D., Catalano, G. and Hoylor, M. (2002) Diversity and power in the world city network, *Cities*, 19 (4): 231-241.

Thrift, N. J. (1989) The geography of international economic disorder. In: Johnston, R.J. and Taylor, P. (eds.) *A World in Crisis?* Oxford: Basil Blackwell, 16-68.

Wang, C. H. (2003) Taipei as a global city: a theoretical and empirical examination, *Urban Studies*, 40 (2): 309-334.

Williams, C. (1996) Understanding the role of consumer services in local economic development: some evidence from the Fens, *Environment and Planning A*, 28: 555-571.

92 年 5 月 29 日　收稿
92 年 7 月 13 日　修正
92 年 8 月 5 日　接受